

谯周论

——兼谈西晋王朝对待蜀吴降士的态度

朱霞欢

(南京大学中文系,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谯周是三国时蜀国益州集团中颇为复杂的一个人物。他精通儒术,又是当地土著,在以“法”治国、“荆楚人贵”的诸葛亮时代并不显达。当曹魏灭蜀时,他力劝刘禅投降,使蜀汉免受兵燹之灾,其本人却因此见贬于后世。谯周门生众多,著名者有文立、杜珍、李密等,他们在入晋后仕途畅顺,青云平步,与吴蜀故地其他贵胄的境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不仅与谯周的生平行事及其影响,也和司马氏政权出身儒学世家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谯周;益州集团;全蜀之功;儒教

中图分类号:K8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3)03-0129-06

谯周是汉季益州土著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在刘璋降刘备时,曾积极表示赞同,但入蜀后却“不与政事”[1](卷四十二《谯周传》);及至魏兵压境,又说服刘禅投降。既为史家称有“全蜀之功”,复亦因此见贬于后世。西晋一统,吴、蜀故地大族贵胄的仕途均甚委顿,但蜀地降臣谯周及其门生却多受眷顾。关于蜀国降士在晋廷的遭际情况的研究仍不多见,对谯周这位一度对历史进程有重要影响的人物研究则更寥寥。本文尝试将谯周生平行事与吴、蜀降士的际遇结合起来,从蜀汉政权各区域集团间的利益冲突及蜀、晋两朝治国政策之不同等多种角度,作一立体的考论。

一 谯周其人及其著述

谯周字允南,蜀汉巴西西充人。巴西乃郡名,属益州,治所在阆中(今阆中)[2]。《晋书·地理志》记载,益州在汉初有“汉中、巴、蜀”三郡。东汉建安六年(201年),刘璋“以巴郡为巴西”。

谯周是一个博览群书、精通儒学、坦诚而有识见的人。《三国志·蜀志·谯周传》记载,他“幼孤,与

母兄同居。既长,耽古笃学,家贫未尝问产业,诵读典籍,欣然独笑,以忘寝食。研精六经,尤善书札。颇晓天文,而不以留意;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遍视也。身長八尺,体貌素朴,性推诚不饰,无造次辩论之才,然潜识内敏。”从其著述看,此当非虚言。

谯周著述甚夥。《三国志·谯周传》云:“撰定《法训》、《五经论》、《古史考》之属百馀篇。”《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并著录有《五经然否论》(即《五经论》)、《古史考》、《三巴记》、《谯子法训》、《谯子五教志》(新《唐志》无“谯子”二字)五种,但均已亡佚。《隋志》另录《论语注》一篇,两《唐志》已不载,则唐时已不见完书。此外,清姚振宗《三国艺文志》和文廷式的《补晋书艺文志》补有《丧服图》、《后汉记》、《礼祭集志》、《蜀本纪》、《益州志》、《异物志》、《讖记》、《天文志》、《灾异志》等九种题为谯周所撰,则其亡佚当在更早之时。

明清时辑有谯周佚著四种。其一,《论语谯氏注》1卷,马国翰辑,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书》。其二,

收稿日期:2002-12-09

作者简介:朱霞欢(1979—),女,浙江省嘉善市人,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专业方向中国文化史。

《五经然否论》1卷,辑本有三,分别为王谟辑《汉魏遗书钞》、马国翰辑《玉函山房辑佚书》及黄奭辑《黄氏逸书考》。其三,《谯周古史考》1卷,章宗源辑,收于《平津馆丛书》、《训纂堂丛书》、《龙谿精舍丛书》。黄奭《黄氏逸书考》辑本作《古史考》,亦1卷。其四,《法训》1卷,亦有三种辑本,分别为陶宗仪《说郛》、黄奭辑《黄氏逸书考》和王仁俊辑《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3]。据《隋志》及两《唐志》,《论语注》原为10卷,《五经然否论》原为5卷,《古史考》原为25卷,《法训》原8卷,可见原书已散佚大半,辑佚所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严可均《全晋文》所辑谯周佚文有题名者共9篇,阙名之断章19篇,分别辑自《三国志》、《后魏书》、《通典》、《御览》、《齐民要术》、《北堂书钞》、《初学记》等[4]。

从谯周著述中可以看出,谯周之学,以经学为核心,而史学亦著。谯周以蜀地土著,多撰有地方史乘,如《三巴记》、《蜀本纪》、《益州志》等。《华阳国志》卷一之魏晋部分,大多即取材于谯周《巴记》。谯周又颇擅讖纬、术数及五行灾异之术。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有云:“故泰山太守应劭、给事中董巴、散骑常侍谯周并撰建武以来灾异,今合而论之,以续前志。”此亦可证谯周所学,颇为当世所重。

二 谯周入蜀与蜀汉统治集团内部的地域集团矛盾

益州本为刘焉、刘璋父子所统治。刘焉入川时,亲戚故旧跟着他来的人很多,形成一个政治性的集团。这些外来地主集团经济势力的发展,必然会使益州土著地主的既得利益受到损害。因此,益州地主如王咸、李权、任歧、贾龙等纷纷武装起兵,意在推翻刘焉的统治。十几年中,战乱不断,直到焉子刘璋继位,才依靠东州兵的力量,平定了内乱。但是,益州土著地主集团对刘璋始终没有好感,刘璋也始终没有能得到他们更多的支持。

刘备能取得益州,正是依靠了土著集团的中坚人物蜀郡人张松、郫人法正等的力量。他们以为只要刘备入蜀,刘璋失势,本集团的势力就可以抬高了。据《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记载:“(张)松还,……说璋曰:‘刘豫州,使君之肺腑,可与交通。’璋皆然之,遣法正连好先主。”过些时候,张松又说刘璋:“不得豫州,则敌攻其外,民攻其内,必败之道。”刘璋于是“遣法正请先主”。又《先主传》注引《吴书》曰:“备前见张松,后得法正,……因问蜀中狭

阔,兵器府库人马众寡,及诸要害道里远近,松等具言之,又画地图山川处所,由是尽知益州虚实也。”[1](卷三十二《先主传第二》)可见,益州土著人士确实对刘氏入蜀发挥了重要作用。

“豫州入蜀,荆楚人贵”。刘备入四川后,绝对信用荆州人士,如诸葛亮、庞统、蒋琬、费祎等,对益州土著则是既拉拢又打击。例如,广汉人彭蒙,刘备入蜀之初,他也立了一些功劳,后来因不愿外放,颇有不满之心,被刘备杀害[1](卷四十《彭蒙传》)。刘备初入蜀,蜀郡张裕对刘备颇无礼。蜀汉政权刚建立,张裕又造谣言说刘备九年后将失掉益州。刘备因此“常嫌其不逊,加忿其漏言”,于是将张裕“下狱,将诛之”,诸葛亮问该安那一种罪名,刘备干脆地说,“方兰生门,不得不钚”。于是,“裕遂弃市”[1](卷四十二《周群传》)。

雷近芳指出,根据陈寿《三国志》各传和裴松之注等资料,除蜀主刘备、禅父子外,蜀汉统治集团有籍可考者凡189人[5](29—34页)。其中,属于刘备故旧集团的有22人,占总考察人数的11.64%;荆楚集团66人,占34.6%;巴蜀集团的构成人数为92人,占48.1%;甘陇集团共9人,比例为4.7%。由此可以看出,蜀汉统治政权内部的四大区域集团的实力很不均衡。甘陇集团最弱,他们人数少,入幕晚,掌握实权,并参与蜀汉决策的人物仅姜维一人,却又因时值蜀汉后期的穷途末路,横遭种种势力的牵掣。故旧集团的人数亦不甚多,但其成员身份特殊,权高位重,他们或与刘备布衣之交,同起而共命(如关羽、张飞);或与蜀汉宗庙与共,裙带紧联(如刘佺、糜竺),因此在重大决策时往往起着决定作用。荆楚集团所拥有的有利条件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其成员大多是失去旧依托而又不甘平庸沉沦的士人。巴蜀集团成员大多为本地豪强,部分人士虽籍属北方或由荆楚而来,但因其入蜀已久,又得遇刘璋,其在蜀汉政权下的基本利益与巴蜀土著一致,因而他们能结成相对坚固的区域自保势力。作为地方势力,巴蜀集团亦极具排外性,极欲维护政治经济的既得利益。但在新政权下,巴蜀集团人数虽多,却远不能企及故旧及荆楚集团的尊显富贵。虽然法正等得遇刘备,可他在巴蜀势力中影响不大,又因早死,未能起多大作用。余则不合作与遭压制者众多。涪人杜微终刘备之世称聋不出,诸葛亮再三礼请不能强起之。刘巴、费诗皆因谏刘备缓称帝王而遭黜

降。孟达亦因“忿争不和”[1](卷四十《刘封传》),备受排挤而领兵降魏。巴蜀势力中,很有一些有实力者,初时尚能隐忍,至刘备方逝、后主幼弱时,黄元、朱褒、雍闿、高定、刘胄等相继起义,一时四方起兵。

因此,像谯周这样的土著人物,虽未见打击,却也并非举足轻重,再加上“性推诚内敏,无造次辩论之才”,终蜀之世,不过任了一个“位亚九列”的光禄大夫,除了在劝刘禅投降时站了出来以外,一直“不与政事”,而以“儒行见礼”[1](卷四十二《谯周传》)。

三 谯周的“全蜀之功”

蜀汉后主景耀六年(公元263年),魏大将军司马昭派钟会、邓艾统率大军共18万人分道伐蜀。钟会由斜谷入汉中,姜维退守剑阁。邓艾以奇军从阴平间道取江油,进克涪县,攻杀诸葛瞻于绵竹,直逼成都。

刘禅急召群臣会商,有的主张投奔东吴,有的建议逃往南中七郡。以谯周为首的益州土著地主集团,却公开主张投降。谯周以为:“自古以来,无寄他国为天子者也,今若入吴,固当臣服。……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明矣。等为小称臣,孰与为大?再辱之耻,何与一辱?且若欲奔南,则当早为之计,然后可果;今大敌以近,祸败将及,群小之心,无一可保,恐发足之日,其变不测,何至南之有乎!”后主犹疑于入南,谯周上疏曰:“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之,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后主“于是遂从周策”[1](卷四十二《谯周传》)。

后人多认为谯周说后主投降是“苟存之道”,谯周是“弩臣”。比如《三国志·蜀志·谯周传》裴注引孙绰的评价:“自为天子而乞降请命,何耻之深乎!夫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推过于其父,俯首而事讎,可谓苟存,岂大居正之道哉!”孙盛亦曰:“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称天子而可辱于人乎!周谓万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礼希利,要冀微荣,惑矣。……禅既暗主,周实弩臣,方之申包、田单、范蠡、大夫种,不亦远乎!”[1](卷四十二《谯周传》注引)

其实,在钟会、邓艾伐蜀之前,谯周似并未有投降之心。他最终选择了劝降,则主要是因为其本人所属的区域集团利益占了上风。

谯周是地道的益州土著,他所作的一切也多以此为出发点。早在诸葛亮时期,谯周就多次劝谏

“魏不可伐”。姜维穷兵黩武,功绩不立,谯周更作《仇国论》以讽。因为蜀汉能否战胜曹魏,夺取天下,于他们这些土著来说无切身的好处,倒是连年征战,会给他们带来利益上的损失;而且如果西蜀真的攻克了洛阳,蜀地的重要程度必然会受到影响,中原人士更会与他们会竞争官禄。对后主在入吴与奔南中间的犹疑,于谯周等来说,无宁投降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蜀汉政权本不能代表他们全部的利益,它的覆亡,也不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灾害,反可驱逐荆楚等外来地主势力,而益州土著地主集团更能获得长足的发展。

不管谯周劝降是否有害于大道,但“刘氏无虞,一邦蒙赖”(陈寿语)却是事实。检阅刘禅降前蜀国的实力,实不容乐观。《三国志·蜀志·后主传》裴注引王隐《蜀记》云:“(禅)又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米四十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余物称此。”查《续汉书·郡国志》顺帝永和五年蜀郡11县有户30.452万,人口135.467万。从永和到汉末,除马相之乱外,成都一直平静。建安十九年,刘璋全城以降。《华阳国志·刘先主志》记先主克蜀之后,“赐诸葛亮、法正、关羽、张飞金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段万匹。其余各有差”[6]。仅刘备赏赐给诸葛亮等四人的财物就有黄金2000斤、白银4000斤,已多于刘禅降魏时国库所存,其他还有马超、赵云、黄忠、李严等将领、数万军士,则赏赐的数目定然极大。蜀地经过刘备父子休养生息几十年,户口、国库怎么反而大有减损?可见,蜀汉50年中,号称治者,只是没有叛乱罢了。封建剥削严重,农民生活困难,逃亡日多,户口锐减,则是真实情况。因此,蜀汉的迅速灭亡,连年征伐、徭役不息才是根本原因。邓艾兵至而后主不敢守城,也正由于此。由此益可见蜀汉末年成都之空虚。

又《三国志·蜀志·后主传》记,蜀汉建兴十四年夏四月,后主“徙武都氏王苻健及氏民四百余户于广都”;延熙十年,“凉州胡王白虎文、治无戴等率众降”,姜维将其“居之于繁县”;延熙十七年冬,姜维又“拔狄道、(河间)河关、临洮三县民,居于绵竹、繁县”。蜀汉国之所以屡徙羌胡人居广都、繁县等水利灌溉之沃野,主要原因就是当时农村凋敝、户口锐减。同时,由于姜维的穷兵黩武,“众庶由是怨

读,而陇巴西亦骚动不宁”[1](卷四十四《姜维传》)。《谯周传》亦云:“军旅数出,百姓凋敝。”正如当时吴国丞相张悌所评价的那样:“今蜀阉宦专朝,国无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劳卒弊,竞于外利,不修守备。”[1](卷四十八《孙皓传》天纪四年注引《襄阳记》)司马昭伐蜀,他估计,“彼强弱不同,智算亦胜,因危而伐,殆其克乎”。

国力不足以维继,人民不愿意作战,益州土著地主投降的论调又高唱入云,蜀汉政权便只有投降这一条路。孙盛等以为彼时“战虽屡北,未有土崩之乱,纵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东鄙以思后图”[1](卷四十二《谯周传》注引),显为不察之言。

司马昭在灭蜀之后,确实也对益州土著地主集团眷顾有加。为了满足他们驱逐外来利益集团的要求,也为了防范蜀汉残余势力在益州的再起,魏咸熙元年(公元264年,灭蜀后的第二年),“内移蜀大臣宗预、廖化及诸葛显等并三万家于河东及关中,复二十年田租”[6](《大同志》)。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曰:“河东郡,今山西省西南部地,与关中隔一黄河。自蜀迁河东者必经关中。徙家财力不能远移及因便请留关中者当有之。惟名势特高具有号召力之家,必徙至河东,以杜后患。此辈皆属高赀巨室,到关中与河东后,仍自购田为地主,晋朝廷免其二十年田租以优之,俾其生活不失在蜀时之优越。”司马昭控制下的曹魏政权内移宗预、廖化、诸葛显等大族,并要求他们一定得徙至河东,如此就将旧蜀汉政权中非益州籍的重要文武官吏都召回中原去,这部分势力终于随着蜀汉的覆没撤出益州了。由于益州土著地主集团没有经过武装过程,因此保卫本阶级利益的力量比较薄弱。西晋末年,流民进入巴蜀,益州地主就无法抵御,而没能像江东世家豪族大地主一样“三定江南”[7]。

对于“全国之功”的第一人谯周,司马昭首先封其为阳城亭侯。又“累下诏所在发遣周。周遂舆疾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骑都尉”[1](卷四十二《谯周传》)。裴松之注引《益部耆旧传》曰:“益州刺史董荣图画周像于州学,命从事李通颂之曰:‘抑抑谯侯,好古述儒,宝道怀真,鉴世盈虚,雅名美迹,终始是书。我后钦贤,无言不誉,攀诸前哲,丹青是图。嗟尔来叶,鉴兹显模。’”一时官显名闻。

四 谯周门生在西晋的境遇及西晋王朝对待蜀吴降士之态度

《晋书》为之立传的谯周门人有五人:罗宪、陈寿、李密、杜轸及文立,皆巴蜀人士,除罗宪外,并见于《华阳国志·后贤志》。

五人各有特色,皆是独当一面的杰出人才。罗宪投身军旅,“方亮严整”,以忠烈闻名;陈寿好学多思,才华横溢,有良史之名,著有《古国志》50卷、《三国志》65卷、《益部耆旧传》10卷。李密入“孝友”列传,文立跻身“儒林”。杜轸号为“良吏”,百姓为立生祠。周之门人“方陈寿、李密为游、夏,以文立为颜回,罗宪为子贡”,能以孔门弟子方之,足见谯周门生数量之众,师生名望之高。

蜀汉降魏后,谯周门生皆能入洛。据《晋书·陈寿传》,陈寿入晋举孝廉,除著作佐郎;出补阳平令,除著作郎;领本郡中正,迁长广太守,不就;授治书御史;母忧去职,起为太子中庶子,未拜。除了陈寿仕途稍坎坷外,余者并在晋廷历任高官。李密为晋武帝赞为“士之有名,不虚然哉”,以太子洗马征至洛,徙尚书郎,出为温令,去为本州大中正,后迁汉中太守[8](卷八十八《孝友列传》)。虽最终被免官,但其子仍出仕,“长子赐,州别驾,汶山太守,少与东海王司马元超友昵。少子兴,太傅参军。幼子硕,宁浦太守”[6](《后贤志》)。杜轸“累迁尚书郎”[8](卷九十《良吏列传》)。文立入晋为州别驾从事,举秀才,拜济阴太守,迁太子中庶子,仕至尚书[8](卷九十一《儒林列传》)。罗宪泰始初入朝,诏曰:“宪忠烈果毅,有才策器干,可给鼓吹。”又赐山玄玉佩剑。泰始六年卒,赠使持节、安南将军、武陵太守,追封西鄂侯,谥曰烈[8](卷五十七《罗宪传》)。

西晋平吴以后,对吴蜀故地旧臣大抵防范多于信任。入晋的其他蜀吴降人,境遇却很难堪。

泰始初,时为太子中庶子的文立“上表请以诸葛亮、蒋琬、费祎等子孙流徙中畿”[8](卷九十一《儒林列传》)。蜀人不见用,可见一斑。《华阳国志·大同志》又记泰始五年,“散骑常侍文立表复假故蜀大臣,名勋后五百家不预厮剧,皆依故官号为降”。文立的意思是,大臣名勋之后,皆当入士,纵使不才,亦不得参加厮剧徭役。反过来,还是说明彼时蜀汉大臣后人的处境艰难。考蜀国名勋之后,在晋廷显扬者确实寥寥。比如诸葛亮,其子瞻及瞻长子尚战死在绵竹;瞻次子京,咸熙元年内移河东,为郿令,后位至江州刺史[1](裴注引《诸葛氏谱》和《晋泰始起居注》)。蜀五虎大将之子大多早亡;蒋琬子蒋斌、蒋显

俱死在乱军中；费祎诸子在史书中也仅记到入蜀的为官，而未提及入晋后的仕宦。

对吴人来说，虽然有司马氏对江南地主的致意笼络，如华谭对武帝策问“绥静新附以何为先”，即建议“当先筹其人士，使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8]（卷五十二《华谭传》），但北人对南人仍有偏见，世代任吴国公卿将相的陆机、陆云兄弟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

“陆机，字士衡，吴郡人也。祖逊，吴丞相。父抗，吴大司马”[8]（卷五十四《陆机传》）。陆机、陆云兄弟吴亡后退居旧里近十年，闭门勤学，太康末始入洛阳。从陆云书札可以窥见南人情绪之一斑。与戴季甫书云，“江南初平，人物失叙。当赖俊彦，弥缝其缺”。与杨彦明书云，“东人近复未有见叙者，公进屈久，恒为邑罔”。陆机入洛后，在《皇太子宴悬圃诗》中，犹自称“蕞尔小臣，邈彼荒域”。陆云答张士然诗亦有“感念桑梓域，仿佛眼中人”之句，具见自卑情绪与桑梓之感。而成都王司马颖幕下，孟超为小都督，竟敢公然斥骂河北大都督全军统帅之陆机为貉奴[8]（卷五十四《陆机传》）。入晋后，陆机颠沛流离，仕途坎坷，先后投过贾谧、赵王伦和成都王颖，最终因“有异志”而为颖所杀，牵连其全家、陆云及其从弟陆喜。“综观陆士衡一生出处及致祸之由，似不能不联系其出身吴人考察之也”[8][9]（74页）。

南北人之间的这种关系，至西晋末尚未改变。葛洪，丹杨句容人，隶籍江南，其祖为吴之大鸿胪，所著《抱朴子外篇·审举篇》尚有表达吴人不平之语，如曰“昔吴士初附，其贡士见偃以不试。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犹复不试”。直至元帝镇江东，还因“时南土之士未尽才用”，才请顾荣推荐吴士，诸人亦始获仕进[8]（卷六十八《顾荣传》）。

但谯周门生杜轸与同郡涪人李骧在晋廷皆任尚书郎，二人齐名，有“蜀有二郎”之号，足见其难能。郎之为官，在西晋实为清选[9]（72页）。西晋王朝对蜀人任高位者，实颇警惕。如蜀人何攀平、吴有功，任扬州刺史。“石崇表东南有兵气，不宜用远人，征拜大司农”[6]（《后贤志》）。由此，更表明文立、杜轸等人能在晋廷颖脱而出、官居高位实为不寻常之事。这固然源于他们本人的才干，然而不该忽略的事实是，他们几位恰好都师从过谯周。

谯周及其门生得以在晋廷显扬的另一原因是他

们均治六经，精通儒术；而司马氏正是儒学大族，西晋的政权基础是高门大族尤其是儒学世家。相对照的是，蜀汉的诸葛亮崇尚法术，以法治国，与儒家思想格格不入。

谯周“研精六经”，“以儒行见礼，时访大义，辄据经以对”[1]（卷四十二《谯周传》），其著作直接与六经有关的即有《论语注》、《五经然否论》。佚文《齐交》言择良友的重要性，“譬之于物，犹之白也，染之以蓝则青；游居交友，亦人之所染也”[4]，是典型的儒家思想。“或曰：君子处陋巷中，奚乐也？曰：乐得其亲，乐得其友，乐圣人之道也”[10]（卷四百六十八），表达孔颜乐处的精神。佚文中还有多处文字论“礼”论“孝”。比如，“羊有跪乳之礼，鸡有识时之候，雁有翔序之仪，而人取法焉”[11]（卷二十九）。“夫孝，百行之本；替本而求末者，未见有得之者也。如或得之，君子不贵矣。乌鸟犹有反哺之心，况人而无孝心者乎”[10]（卷九百二十）。《三国志谯周传》记谯周对刘禅保证，降后魏国一定会“裂土以封陛下”，不然，“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大义凛然的气势亦颇有儒者风范。

谯周弟子中，李密以孝闻名，讲学则“忘疲”[8]（卷八十八《孝友列传》）。杜轸不仅“博涉经书”，而且在地方上为官时“道以德政，风化大行，夷夏悦服”[8]（卷九十《良吏列传》），百姓生为立祠，其行为尤与汉代循吏身兼吏、师双重身份的精神相通。文立“专毛诗，三礼”，做地方官时，“政事修明”，事东宫后，又“尽辅导之节”[8]（卷九十一《儒林列传》）。罗宪虽是武将，然其行为处事亦多儒风。

诸葛亮治理蜀国主要根据的还是“法”。进入益州以后，他认为刘焉、刘璋父子“以宽济宽”，“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致使蜀土人士专权自恣[1]（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蜀记》），蜀中人民“思为乱者，十户而八”[1]（卷三十七《法正传》）。针对这种情况，诸葛亮提出了一套由乱到治的方针，即《便宜十六策·治乱策》。其中最重要的是“先理强，后理弱”。理强，即打击三蜀豪强，主要措施是“威之以法”，“限之以爵”[1]（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蜀记》）。为此，诸葛亮制定了一系列的法令。《三国志·伊籍传》说伊籍“与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共造蜀科”。陈寿《诸葛亮集目录》中有《法检》上下篇，惜均不见原文。这些科令，应是当时执法的依据。对于诸葛亮的法治，《三国志·张裔传》记载，张裔常

称道诸葛亮“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陈寿也在其《诸葛亮传》中曰“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应是很客观的记述。

西晋的政权基础是门第与儒学的结合。司马氏即以儒学大族闻名。司马懿之父司马防以守礼法达名于世,司马懿本人“博学洽闻,服膺儒教”[8](卷一《宣帝纪》)。支持司马氏的有颖川的钟毓、钟会兄弟、陈泰(陈群之子)、荀顛(荀彧第六子)。这些都

是汉末的著姓名儒。如陈氏,陈群之祖陈实死时,“海内赴者”达3万余人,二子陈纪、陈谌“齐德同行”,与其父“并著高名,时号三君”[12](卷六十二《陈实传》)。陈群即陈纪之子。钟繇是钟皓的曾孙,钟皓“博学诗律,教授门生千有余人”,被李膺叹为“至德可师”。钟繇少举孝廉,当时被认为“功高德茂”[1](卷十三《钟繇传》)。这样倚赖儒学世家的政权自然也看重治经的谯周及其门生。

参考文献:

- [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2]张舜徽.三国志辞典[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
- [3]上海图书馆.中国丛书综录[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4]严可均.全晋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5]雷近芳.试论蜀汉统治集团的地域构成及其矛盾[J].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93,(4).
- [6]常璩.华阳国志[M].任乃强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7]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 [8]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9]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0]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11]徐坚,等.初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12]范曄.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On Qiao Zhou and Xi Jin's Attitude Toward Shu Wu Dynasty Capitulators

ZHU Xia - hua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Zhejiang210093, China)

Abstract: Qiao Zhou, master of Confucianism and aboriginal, one of the complicated figures of the Yizhou clique of Shu Kingdom during Three Kingdoms Period, is not prominent in the times of Zhuge Liang, who believes in "rule by law" and employs Jing Chu personnel, and persuades Liu Chan to surrender to Wei Kingdom. This persuasion leads to peace of the country but also inflicts scolding upon him. However, in sharp contrast to other Wu Shu capitulators, he and his disciples are more politically comfortable in Jin Dynasty, which results from the fact that the Jin Dynasty and Qiao Zhou share the same belief: Confucianism.

Key words: Qiao Zhou; Yizhou Clique; exploit of saving Shu; Confucianism

[责任编辑:凌兴珍]